

# 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

方 辉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市 250100)

关键词: 商周; 夷式簋; 传播; 族群变动

摘 要: 夷式簋是商及西周时期分布于鲁北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陶器。本文对夷式簋的研究历史、出土背景、器物组合、流行地域及年代进行了梳理,对夷式簋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族群流动做了研究,指出了商末周初夷式簋的西向传播可能与以秦人为代表的东夷族群的西迁有关。

**Key words:** Shang-Zhou period; Yi-style *gui* food container; diffusion;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Abstract:** The Yi-style *gui* food container was a type of distinctive pottery vessel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Shandong region of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the history of its study, the background of its unearthing, its association with other objects and the area and date of its prevalence, and studies its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ethnic migration it reflec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westward spread of the Yi-style *gui* in the late Shang and early Zhou may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the Dongyi Ethnic Group represented by the Qin people.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5.04.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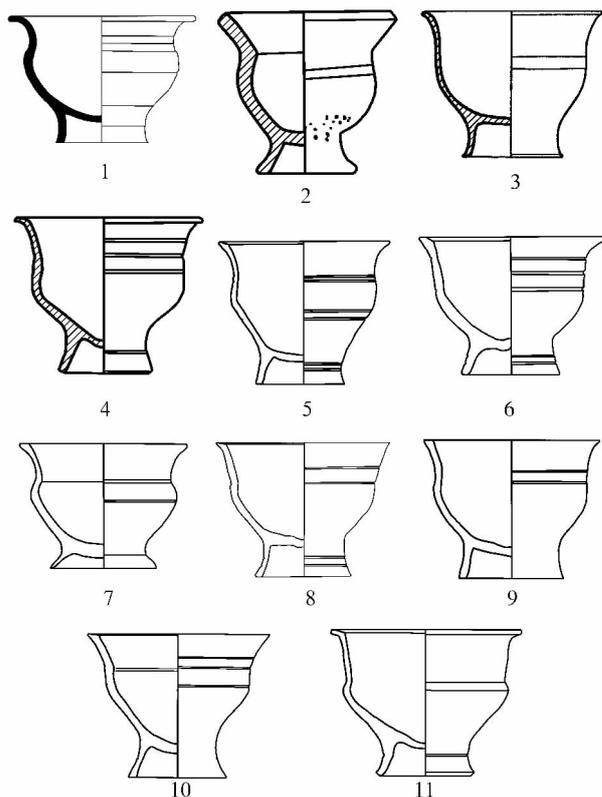
## 一、绪言

簋,是一种盛放稻粱食品的器具,考古学上一般把带有圈足的碗形食器称之为簋。陶簋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夷式簋,是一种存在于晚商早周时期而又有别于商式簋(或殷式簋)与周式簋的特殊陶簋,因其最早出现并流行于商代东夷之地的山东北部地区,故有此名。关于商式簋<sup>[1]</sup>和周式簋<sup>[2]</sup>,许多学者做过分型分式的年代学研究,得出了可信的结论,但因为夷式簋的分布是区域性的,总的数量相对而言要少,因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商代的夷式簋最早出现于鲁北地区,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泥质灰陶或黑陶,多经磨光,制作精细;形制为敞口或侈口,卷沿,鼓腹或收腹,圈足较高,或被称为高圈足簋;素面或有简单的凹弦纹装饰;口径一般在18~22厘米,通高

在16~20厘米;一般存在于墓葬当中,作为随葬品“鬲、豆、簋”固定陶器组合三件套之一而存在。从器形及器物组合上来看,这种夷式簋与商式簋和周式簋功能并无二致,但其形制上有所区别,因而颇具区域文化特点且易于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商早周,这种夷式簋还向中原地区乃至关中和陇东地区传播,成为殷周之际陶器流动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将探讨夷式簋的年代、传播及来龙去脉,希望有助于研究商周时期族群间的互动。

## 二、鲁北地区夷式簋的分期、年代与来源

鲁北地区商代夷式簋早在1930年代就有发现,地点集中在济南附近,具体地点一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洪家楼<sup>[3]</sup>,二是历城王舍人庄<sup>[4]</sup>,报道者均为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林仰山(F. S. Drake)。因为当时对于商文化的认识不深,林氏将洪家楼所出土的1件夷式簋(图一,1)定为黑陶文化即



图一 鲁北地区出土的商代夷式簋

1. 洪家楼 2. 苏埠屯 M7 : 25 3. 大辛庄采集
4. 大辛庄 M72 : 11 5. 马安 M99 : 2
6. 马安 M106 : 1 7. 马安 M111 : 1
8. 马安 M120 : 1 9. 马安 M80 : 1
10. 马安 M88 : 1 11. 马安 M131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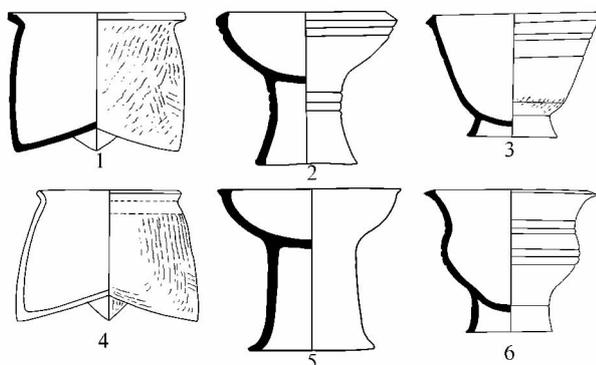
龙山文化的遗物<sup>[5]</sup>。但对于王舍人庄出土的一例，林仰山正确地判断为商代，这是因为这件器物与其他 7 件典型的商式陶器共出，而且他认为是同坑出土。现在看来，林氏对于王舍人庄陶簋年代的判断是对的，但所谓同坑出土则不实。以现在对于商代晚期墓葬器物组合和陶器分期的认识，这 8 件陶器应出自至少三个遗迹单位，其中两套鬲、豆、簋应出自 2 座墓葬（图二），其年代分别为殷墟三、四期。实际上，直到殷墟文化分期比较清楚的 1960 年代，对于这类夷式簋的年代认识仍然不足，如邹衡先生曾著文认为其中的陶鬲和陶豆属于殷

墟三期，但并未对陶簋的年代做出判断<sup>[6]</sup>。

因为夷式簋出土比较零散且数量有限，直到 1980 年代，随着此类器物发现的增多，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有学者认识到，鲁北地区商文化保持着较明显的本地传统文化因素，将这种高圈足簋连同夹砂大口罐、素面甗、素面鬲等视为“东方文化体系的器物”<sup>[7]</sup>。也有学者指出，晚商时期山东地区多见的“厚胎宽斜沿高圈足簋”是“异于中原地区同期常见”的器物<sup>[8]</sup>。商代表式簋延续到周代，学者注意到广饶五村遗址周代墓葬中所见的“C 型簋，在其他地方少见，可能代表一种地方类型。”<sup>[9]</sup>关注到这类器物的特殊性。

目前看来，商周时期鲁北地区夷式簋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潍坊、淄博、济南一带，基本上沿泰沂山脉北缘分布。其中，发掘出土的商代表式簋数量不多，主要出自以下几处遗址的墓葬之中。

1986 年，潍坊青州苏埠屯商代墓地 M7 出土 1 件。该墓规格较高，南北长 3.65 米，东西宽 2.60 米，葬具为一棺一椁，二层台上殉葬 3 人，有腰坑殉犬现



图二 早年济南王舍人庄出土的夷式簋

1. 王舍人庄 Fig 6 2. 王舍人庄 Fig 8 3. 王舍人庄 Fig 2
4. 王舍人庄 Fig 4 5. 王舍人庄 Fig 7 6. 王舍人庄 Fig 1

象。出土青铜器 16 件，觚、爵带有“亚醜”铭文。陶器组合为豆、簋、罐、觚、爵。标本 M7:25，泥质褐陶，束颈，敞口，鼓腹，圜底，圈足外撇，腹下部饰绳纹。口径 18.4 厘米，高 16.9 厘米。（图一，2）墓葬的年代为殷墟四期<sup>[10]</sup>。

1955~1963 年，济南历城大辛庄遗址曾采集 1 件。泥质灰陶，素面，口外侈，卷沿，圆唇，曲腹微鼓，高圈足，器壁有部分内瘪，口径不圆，调查者认为是明器。口径 20 厘米，底径 11 厘米，高 16.5 厘米。（图一，3）<sup>[11]</sup> 2003 年，济南历城大辛庄商代墓葬出土多件，已经报道的 1 件出自 M72。该墓为小型铜器墓，墓圻南北长 3 米，东西宽 1.20 米，葬具为一棺一椁，二层台上殉犬 10 只，腰坑殉犬 1 只。青铜器组合为鼎 1、觚 1、爵 1，陶器组合为鬲 1、豆 1、簋 1。标本 M72:11，泥质深灰陶，圆唇，平折沿，高颈微束，腹部微鼓，下腹内收，器底下垂，高圈足。口径 26 厘米，高 22.3 厘米。（图一，4）年代为殷墟三期<sup>[12]</sup>。

2004~2005 年济南章丘马安商代墓地出土 7 件，均出自小型陶器墓，葬具为一棺，有腰坑殉牲习俗。陶器组合非常简单，最多为 2 件，或 1 件。标本 M99:2，泥质黑皮陶，敞口，方唇，上腹内曲，下腹折收，圈足，腹壁和圈足饰三组六周凹弦纹。口径 22.5 厘米，高 18.9 厘米。（图一，5）标本 M106:1，泥质灰黑陶，敞口，尖唇，上腹较直，下腹折收，圈足，腹壁和圈足共饰五周凹弦纹。口径 26.4 厘米，高 20 厘米。（图一，6）标本 M111:1，泥质黑皮陶，尖圆唇，沿面较平，上腹内曲，下腹折收，圈足，外壁饰两周凹弦纹。口径 24 厘米，高 18.2 厘米。（图一，7）标本 M120:1，泥质黑皮陶，敞口，上腹内曲，下腹折收，圈足，腹壁和圈足饰二组四周凹弦纹。口径 22.5 厘米，高 17.4 厘米。（图一，8）标本 M80:1，泥质黑皮陶，敞口，方唇，上腹内

曲，缓折腹，圈足，腹壁饰二周凹弦纹。口径 22 厘米，高 17.4 厘米。（图一，9）标本 M88:1，泥质黑皮陶，敞口，尖唇，高折腹，圈足，腹壁和圈足饰四周凹弦纹。口径 22.4 厘米，高 17.6 厘米。（图一，10）标本 M131:1，泥质黑皮陶，方唇，斜折沿，直腹，下部外折，粗圈足，圈足上饰一周凹弦纹。口径 26.8 厘米，高 20 厘米。（图一，11）<sup>[13]</sup> 以上墓葬的年代为殷墟三、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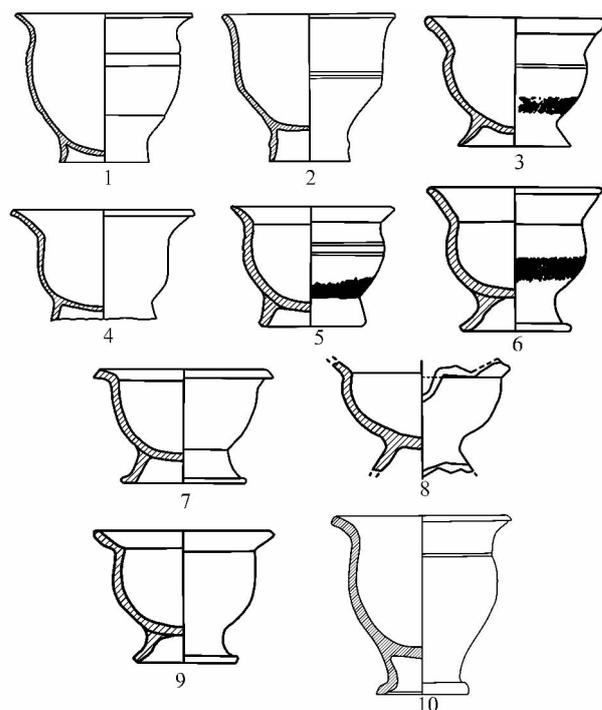
鲁北地区其他商代遗址也发现有夷式簋，但均系调查采集品。

青州赵铺遗址出土 6 件陶簋<sup>[14]</sup>，除了经过发掘的标本 M1:1 为商式簋之外，其他均为夷式簋。属于商代的有：标本采：26，口径 25.5 厘米，高 22 厘米。（图三，1）标本采：27，口径 26 厘米，高 22 厘米。（图三，2）

潍坊昌乐河西和宇家两处遗址调查采集到多件簋，而且器形富于变化，说明延续了较长的时间。其中属于商代晚期的器物，河西标本 54:26<sup>[15]</sup>，泥质灰陶，敞口，宽沿微外翻，圆唇，束颈，鼓腹，矮圈足，腹上部饰凹弦纹，下部饰一周绳纹带。口径 19.6 厘米，高 14.8 厘米。（图三，3）河西遗址出土的另 1 件陶簋<sup>[16]</sup>。标本 54:22，泥质灰陶，敞口，宽沿外折，腹壁近直，圈足残缺。素面。口径 24 厘米，残高 16 厘米。（图三，4）

潍坊寿光涡宋台遗址采集 3 件<sup>[17]</sup>。标本 21:1，口径 20.8 厘米，高 16 厘米。（图三，5）标本 21:9，口径 23 厘米，高 19.4 厘米。（图三，6）标本 21:8，口径 24.2 厘米，高 16 厘米。（图三，7）其中后者保留了东夷式陶簋的基本器形，但口沿部位有与商式陶簋融合的特征，可称为商夷融合式簋。后文我们将看到，这种融合了两种文化因素的陶簋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

潍坊寿光丰城西村遗址采集 1 件<sup>[18]</sup>。



图三 鲁北地区采集的商代夷式簋

1. 赵铺采:26 2. 赵铺采:27 3. 河西 54 :26  
4. 河西 54 :22 5. 涡宋台 21 :1 6. 涡宋台 21 :9  
7. 涡宋台 21 :8 8. 丰城西村 84 :1 9. 皇姑顶 8 :9  
10. 兰家 BLSZ :28

标本 84:1, 口径 23.2 厘米, 高 17.4 厘米。  
(图三, 8)

淄博周村皇姑顶遗址采集夷式簋 1 件<sup>[19]</sup>。标本 8:9, 残高 16.5 厘米。(图三, 9)

滨州兰家采集夷式簋 1 件<sup>[20]</sup>。标本 BLSZ:28, 泥质灰黑陶, 侈口, 圆唇, 宽卷沿, 圆弧腹, 高圈足, 颈下部饰一周凹弦纹。口径 19.6 厘米, 高 17.3 厘米。(图三, 10)

从同时采集到的陶鬲等分析, 以上采集品的年代, 除了青州赵铺遗址 2 件年代较早之外, 其他夷式簋年代亦应该在殷墟三、四期。从出土背景来看, 出土单位明确者均出自墓葬, 如大辛庄、王舍人庄、马安和苏埠屯等, 尚不见出土于其他类遗迹单位的例子。其中, 苏埠屯 M7 规格较高, 出土青铜

器 16 件, 觚、爵带有“亚醜”铭文。大辛庄 M72 也是一座铜器墓, 出土鼎、觚、爵各 1 件, 是一座中等规格的贵族墓, 但夷式簋更多的则出土于规格较低的小型陶器墓中, 如马安墓地所见者。这说明, 鲁北地区商代夷式簋的使用者似并无身份高低之分, 但相对而言, 墓主人地位较高者较少使用, 更多的见于一般平民墓中。

夷式簋与商式簋在同一墓地中共存, 是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几乎所有存在夷式簋的墓地或遗址, 都可见到两种陶簋并存的现象, 而就绝对数量而言, 不同等级的墓葬中两种陶簋所占比例似乎不同。在笔者所主持发掘的大辛庄遗址商代墓葬中, 存在夷式簋的比例不足 30%。在另一规格较低的马安商代墓地中, 以陶簋作为随葬品的墓葬共 10 座, 其中随葬商式簋者有 3 座, 以夷式簋随葬者则有 7 座, 夷式簋随葬占到用簋墓葬的 70%。也就是说, 夷式簋主要在中小型墓葬中使用, 而主要流行于小型墓中。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夷式簋与商式簋虽然共存于同一墓地, 但却并不共存于同一墓葬。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二者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 另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两种陶簋在族属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有学者认为, 鲁北地区以大辛庄类型为代表的商文化存在着以夹砂褐陶陶系为特征的“第二类文化遗存”, 并认为它们是本地区东夷文化在商代的遗留, 它们主要存在于大辛庄类型的早期阶段, 随着商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到了晚商即殷墟文化时期, 这类遗存已渐趋消失<sup>[21]</sup>。笔者同意论者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方法, 但同时认为, 所谓第二类文化遗存在早期阶段主要表现在以素面鬲、觚、鼎和罐为主的实用器物上, 这些器物到了晚商阶段确已很少见到, 但土著因素实际上并没有消失, 它以一

种隐藏的方式出现，墓葬中的夷式簋就是其代表。也就是说，从岳石文化继承而来的夷式簋在晚商或殷墟文化晚期进入本地区葬仪系统，堂而皇之地与商式簋并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东夷文化因素在本地的存续这样一个事实。允许夷式簋进入当地的随葬品组合系统，应该是商化了的夷人在随葬器物选择上的一个结果，尽管其后来的使用者也许并没有东夷族属认同上的自觉，正如使用商式簋随葬的墓主人不一定是纯粹的商人一样。或者说，夷式簋的使用，或许已经演变成葬仪上的一种时尚，而这种器物本身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无论如何，夷、商之争应该是夷式簋、商式簋这两种陶簋并存的大背景。我们知道，夷商之争贯穿于整个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末期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商王乙、辛时期屡次征伐夷方，且其涉及的主要区域就在鲁北地区，就很能说明问题<sup>[22]</sup>。

夷式簋出现于商代、尤其是晚商时期的鲁北地区，其来源如何？商代之后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讨论商代夷式簋的年代分期。如上所述，商代夷式簋虽然早就有发现并见诸报道，但其集中发现则是 1980 年代以后的事。鉴于夷式簋大都出自墓葬，而且往往伴有其他器物，尤其是这些伴出器物的年代比较明确，这就为这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了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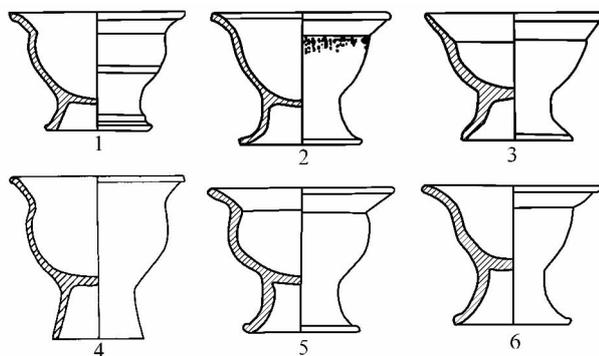
年代较为明确的是大辛庄 M72，年代相当于殷墟三期。该墓出土的陶鬲（M72:13）具有殷墟三期文化的特点，陶豆（M72:12）是典型的商式豆，形制、纹饰与安阳殷墟苗圃北地 M175 所见陶豆一致<sup>[23]</sup>。同属于本期的还有苏埠屯 M8、马安 M80、M99、M111、M106、M120，大辛庄早年调查发现的 2 座墓葬也应属于本期。

相当于殷墟四期的单位可举马安 M88，该墓所出土的陶鬲和陶鼎均具备殷墟四期陶器的特点。前举 M88:1 簋可

为该期代表器物。

由于标本数量所限，目前对于鲁北地区商代夷式簋的演变顺序并不是很清楚。大约在殷墟四期或商代末年始，夷式簋似乎分化为 A、B 两种不同的类型。A 型以折沿，鼓腹为特点，如大辛庄标本 M72:11；B 型则以卷沿，收腹为特点，如马安标本 M88:1。A、B 两型夷式簋共同的演变趋势是圈足不断加高。西周时期的夷式簋也是按照这一规律发展的。

西周早期的夷式簋，可以潍坊昌乐宇家 M1 出土的一例为代表<sup>[24]</sup>。该墓为小型陶器墓，头向东，未发现葬具，共出土 5 件陶器，计鬲 1、簋 1、罐 1、豆 2，报道者认为时代在西周早期，可从。标本 65:10，泥质灰陶，侈口，宽沿，方厚唇，深腹，圜底，圈足，腹部和圈足均饰凹弦纹。口径 24.8 厘米，高 17.2 厘米。（图四，1）可归入本期的其他夷式簋还有昌乐河西标本 54:28<sup>[25]</sup>，泥质灰陶，敞口，宽沿微折，方厚唇，腹壁下收，圈足较高。口径 24 厘米，高 18.4 厘米。（图四，2）属于本期且出土 B 型夷式簋的还有广饶五村 M11<sup>[26]</sup>。该墓为小型陶器墓，随葬陶器 2 件，分别为簋、罐。标本 M11:1，泥质灰褐陶。口径 22 厘米，高 15.4 厘米。（图四，3）济南历城唐冶遗址出土 6 件，但发掘报告只公布了 1 件



图四 鲁北地区出土的西周早、中期夷式簋

1. 宇家 65:10
2. 河西 54:28
3. 五村 M11:1
4. 唐冶 H138:2
5. 周家村 M2:118
6. 周家村 M2:60

(H138:2)<sup>[27]</sup>, 夹砂褐陶, 圆唇, 卷沿, 圆腹, 圜底。口径 21 厘米, 足径 10.8 厘米, 高 19.6 厘米 (图四, 4)。从共出陶鬲 (H138:1) 来看, 为西周早期无疑。

西周中期的两种类型的夷式簋在黄县东营周家村墓葬 M2 出土的陶簋中均有发现。该墓共出土陶簋 31 件, 原报告分为三型。除了其 A 型簋属于特例之外, 其 C 型簋是西周中期典型的周式簋, 而其 B 型实际上包括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夷式簋<sup>[28]</sup>。本期的 A 型夷式簋则可举标本 M2:118, 泥质灰陶, 敞口, 折沿, 鼓腹, 高圈足。口径 25.2 厘米, 高 21 厘米。(图四, 5) B 型夷式簋可举该墓标本 M2:60, 泥质红褐陶, 敞口, 卷沿, 圆唇, 高圈足, 口沿上有一周凹弦纹。口径 23.6 厘米, 高 18.6 厘米。(图四, 6)

西周中期之后 B 型夷式簋在胶东半岛地区的演变情况, 王青曾做过研究。他所划分的 A 型陶簋即本文所说的 B 型夷式簋。他认为这类陶簋的下限是春秋早期, 并分别以昌乐岳家河标本 M134:2 和昌乐常家庄采集的标本 13:14 作为西周晚期 AII 和春秋早期 AIII 的代表, 意见是可取的<sup>[29]</sup>。笔者认为, 在他所划分的 AII 簋之前, 还可以植入栖霞县大北庄墓葬出土的 2 件陶簋, 报告认为随葬陶器的年代从西周早期到东周早期<sup>[30]</sup>。从陶豆的形制来看, 墓葬的年代应为西周晚期。标本之一, 泥质灰陶, 大敞口, 卷沿, 高圈足, 足部饰粗弦纹两周。口径 24.4 厘米, 高 18.4 厘米。另外, 青州赵铺, 标本采:29, 也可作为西周晚期夷式簋的典型例子, 形制为圆唇, 敞口, 底呈弧形, 喇叭形高圈足。口径 15.5 厘米, 高 13 厘米<sup>[31]</sup>。

西周晚期之后 A 型夷式簋已经演变为簋形豆或深腹豆, 这类簋春秋早期可以长清仙人台 M6 出土者为代表<sup>[32]</sup>。标本 M6:B45, 泥质灰褐陶, 宽卷沿, 圆鼓腹, 高圈

足, 素面。口径 20.6 厘米, 高 24.4 厘米。春秋中期的夷式簋则以新泰郭家泉标本 M2:1 深腹豆为代表<sup>[33]</sup>, 形制为泥质灰皮陶, 方唇, 平折沿, 直领, 深腹, 圜底, 喇叭形座, 领下一周凹弦纹。口径 24 厘米, 高 24.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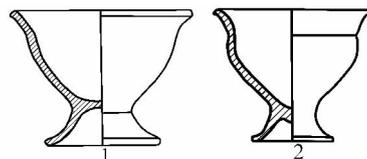
总之, 商周时期的夷式簋总的发展趋势是器体从矮到高。器身的变化大约从西周早期开始分化并演变为其他器形或器类。深腹者 (A 型) 演变为簋形豆或豆形簋, 收腹者 (B 型) 演变为盘形豆, 它们是两周时期山东半岛地区的代表性器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西周早期的夷式簋不但出土于墓葬, 也有少量见于居住址, 如唐冶标本 H138:2, 这件器物一改夷式簋泥质灰陶的风格, 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夹砂褐陶者, 与周代夷人风格的素面夹砂褐陶系器物如鬲、甗、罐等构成风格一致的器物组合。

现在讨论商代夷式簋的来源问题。前引王迅的论著中认为晚商的高圈足簋来自岳石文化<sup>[34]</sup>。王青后来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sup>[35]</sup>。笔者同意他们的观点。

岳石文化的夷式簋主要分布于鲁北地区, 是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和王推官庄类型的典型器物。一般为泥质陶, 形制为敞口或侈口, 卷沿, 收腹, 圈足。这一形制奠定了此后数百年间夷式簋演变的基础。

目前所知岳石文化的夷式簋主要出土于以下地点。

寿光市火山埠采集 (20:68)<sup>[36]</sup>, 泥质黑陶, 敞口, 方唇, 深腹, 喇叭形圈足。口径 22.8 厘米, 高 16.8 厘米。(图五,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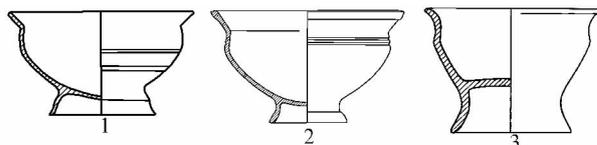


图五 岳石文化夷式簋  
1. 火山埠 2. 郝家庄

青州市郝家庄 (H6:52)<sup>[37]</sup>, 泥质灰陶, 敞口, 卷沿, 深腹, 矮圈足较细。(图五, 2) 先期调查中也发现有口腹部残片<sup>[38]</sup>。

然而, 夷式簋在岳石文化中的数量毕竟不多, 以至于学者们推测可能源自于其他地区。如王迅认为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sup>[39]</sup>, 笔者也曾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sup>[40]</sup>。王迅还认为其与早商文化的陶簋也有一定联系。需要指出的是, 岳石文化并不缺乏圈足器, 其陶豆和圈足尊等都是圈足器, 而且, 岳石文化陶簋为卷沿, 是该文化罐、盆类陶器典型的共有特征。因此, 尽管夷式簋可能受到其他同时期文化的影响, 但其自身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些。笔者甚至认为, 前引青州赵铺标本采: 26 (见图三, 1)<sup>[41]</sup>, 实际上是在岳石文化深腹罐底部加上圈足而形成的, 可能代表了岳石文化早期的圈足簋, 火山埠、郝家庄的陶簋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并吸收早商文化陶簋的影响而形成的。该报告已经指出, 赵铺遗址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 半圆形双孔石刀 (采: 6) 就是岳石文化典型器物, 因此, 将赵铺这件陶簋定为岳石文化遗物除了器形上的相似性, 也有地层方面的根据。

陶簋在早商文化或二里岗期文化中流行甚广, 是该文化的典型器物。不过, 早商陶簋腹部较浅, 略呈盆形, 与岳石文化陶簋差别明显, 而河南郑州、荥阳附近出土的二里岗期陶簋不在少数, 如郑州南关外遗址中层也曾出土过腹部较深的陶簋<sup>[42]</sup>, 可与岳石文化陶簋相比较, 如标本 H62:10, 泥质黄灰陶, 磨光, 敞口, 沿外侈, 凸肩, 鼓腹,



图六 商代前期陶簋

1. 郑州南关外 H62:10 2. 荥阳薛村 M29:2 3. 鄆邓 H32:41

圆底, 圈足, 腹部饰划纹五周。口径 25.5 厘米, 高 14 厘米。(图六, 1) 又如荥阳薛村标本 M29:2<sup>[43]</sup>, 泥质灰陶, 敞口, 窄平沿, 束颈, 腹略鼓, 肩部饰两周凹弦纹。口径 32.1 厘米, 高 18.5 厘米。(图六, 2) 与商代夷式簋形制接近的还有一种粗圈足陶簋, 见于下七垣文化, 形制为圆唇, 卷沿, 收腹, 高圈足, 其卷沿特征与岳石文化陶簋接近, 而高圈足风格接近于鲁北商代晚期夷式簋<sup>[44]</sup>。(图六, 3) 数量不多的岳石文化夷式簋应该是在本身传统的基础上, 吸收早商同类器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器种。

总之, 鲁北地区的商代夷式簋独具特色, 其祖型应来自于岳石文化陶簋, 自身有着比较清晰的发展演变规律, 但也不排除接受了周边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商代前期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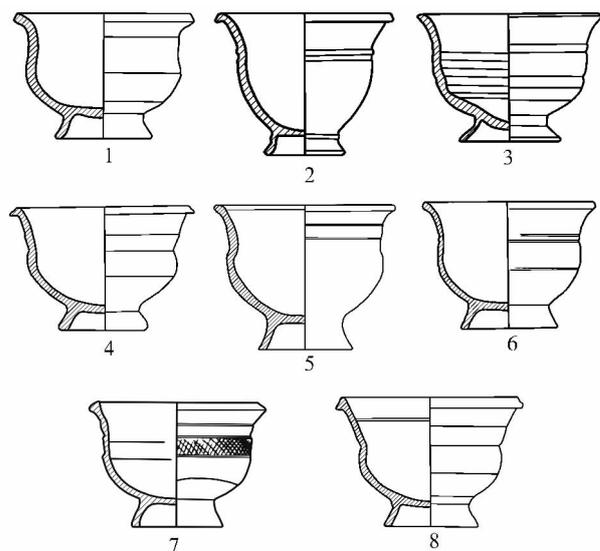
### 三、安阳殷墟出土的晚商时期夷式簋及其历史背景

商时期夷式簋除了见于鲁北地区之外, 最为集中的另一个地点就是晚商都城安阳殷墟了。目前所见主要出土以下地点。

首先是出自墓葬者的 3 例。

1995~1996 年, 安阳刘家庄发掘殷代墓葬 34 座, 其中 M12 出土 1 件夷式簋。该墓为小型陶器墓, 墓向为 195°, 葬具为一棺, 有腰坑殉犬, 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觚、爵。标本 M12:4, 泥质灰陶, 侈口, 上腹近直, 下腹外鼓, 圈足较高, 腹部饰凹弦纹三周。口径 20.8 厘米, 高 15.2 厘米。(图七, 1) 年代为殷墟文化三期<sup>[45]</sup>。

1985~1987 年, 安阳市梯家口村发掘殷墓 21 座, M3 出土夷式簋 1 件。该墓是面积最大的一座铜器墓, 墓向为 189°。葬具为一棺一椁, 有腰坑殉犬, 随葬铜器组合为鼎、觚、爵, 陶器组合为觚、爵、簋。标本 M3:6, 泥质红陶, 大口外侈, 下腹外鼓, 腹饰三周阴线



图七 安阳殷墟发现的夷式簋

1. 安阳刘家庄 M12 : 4 2. 梯家口村 M3 : 6 3. 太平庄 M5 : 1  
4. PNT1④ : 2 5. GT104⑥ : 38 6. 小屯 H14 : 46  
7. 小屯 H14 : 40 8. 小屯南地 H46 : 5

纹，圈足上饰一周凸棱。口径 24.6 厘米，高 20.2 厘米。(图七，2) 时代属于殷墟文化三期<sup>[46]</sup>。

1986~1992 年，安阳市太平庄西发掘殷墓 5 座，M5 出土夷式簋 1 件。该墓为小型陶器墓，墓向为 191°。墓主人为一少年女性。葬具为一棺，有壁龛，腰坑殉犬，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簋。标本 M5 : 1，侈口，沿面内凹，方唇，束颈，腹微鼓，高圈足，壁内有引线纹数周，颈、腹部饰弦纹数周。口径 22.8 厘米，高 16.5 厘米。(图七，3) 时代为殷墟文化三期<sup>[47]</sup>。

殷墟所见 3 座出土夷式簋的墓葬皆为殷墟三期，说明这一时期应是殷墟与鲁北地区商、夷族群间互动比较频繁的时期。3 座墓葬皆西南向，均有葬具且腰坑殉犬，1 座为铜器墓，规格较高，另 2 座则为陶器墓，反映了墓主人身份虽有差异，但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墓葬之外，还有出自文化层和其他遗迹单位的夷式簋。共 5 例。

第一例，标本 PNT1④ : 2，唇外折，腹

部饰弦纹。口径 24 厘米，高 16.7 厘米。(图七，4) 年代为苗圃 III 期即殷墟三或四期。从发掘报告来看，标本 PNT1④ : 2 出自殷墟苗圃北地文化层，根据发掘报告描述，苗圃北地主要是铸铜作坊遗址<sup>[48]</sup>。

第二例，标本 GT104⑥ : 38，出自小屯西地第一区<sup>[49]</sup>。敞口，颈内收，下腹略鼓，高圈足，口下饰弦纹。口径 26 厘米，高 20.5 厘米。(图七，5) 年代同上，亦即殷墟三、四期。根据描述，这里的文化层堆积为一条所谓“大灰沟”及其废弃后的堆积。

第三、四两例均见于安阳小屯。安阳小屯 T43 (2) H14 为一深达近 10 米的椭圆形窖穴，废弃后作为灰坑使用，2 件夷式簋出自其中。DII 式簋 H14 : 46，侈口圆唇，短颈鼓腹，圈底，矮圈足略外侈，颈饰弦纹二周，腹中部有细弦纹一周，腹下部绳纹抹光。口径 22 厘米，高 16.4 厘米。(图七，6) 标本 H14 : 40，为夷商融合式，即口沿部位为商式簋特征，器身部位为典型的夷式簋，属于商夷融合式器物。(图七，7) H14 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早阶段<sup>[50]</sup>。H14 打破同期的房址 F5，而 F5 为一“简陋居室或工棚之类”，其他同时期的房址也都较小，一般有灶坑，发掘者认为大多数为居住房屋。

第五例是 1973 年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的 1 件夷式簋<sup>[51]</sup>，也是夷商融合式簋。标本 H46 : 5，泥质灰陶，侈口，鼓腹，高圈足，缘内壁凹弦纹靠下，腹外饰三道弦纹。(图七，8) 年代为小屯南地中期，绝对年代为康丁、武乙、文丁时代，即殷墟三期。灰坑 H46 所在的小屯南地主要是殷墟中晚期的窖穴和房址，发掘者根据窖穴内出土有卜辞，认为小屯南地“已是当时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和占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因报道过于简略，H46 属于何种性

质，目前并不清楚。

安阳殷墟灰坑和文化层中也有夷式簋出土，而且所占比例不小，这是鲁北地区乃至陕甘地区所不见的，说明殷墟的夷式簋除了用于随葬之外还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其在功能上有所扩展。它们的形制均为鲁北地区常见的型式，年代均属于殷墟三、四期。考察其出土环境，一般为普通居址和铸铜遗址。这说明，殷墟夷式簋的使用者身份应该较低，其中不乏手工业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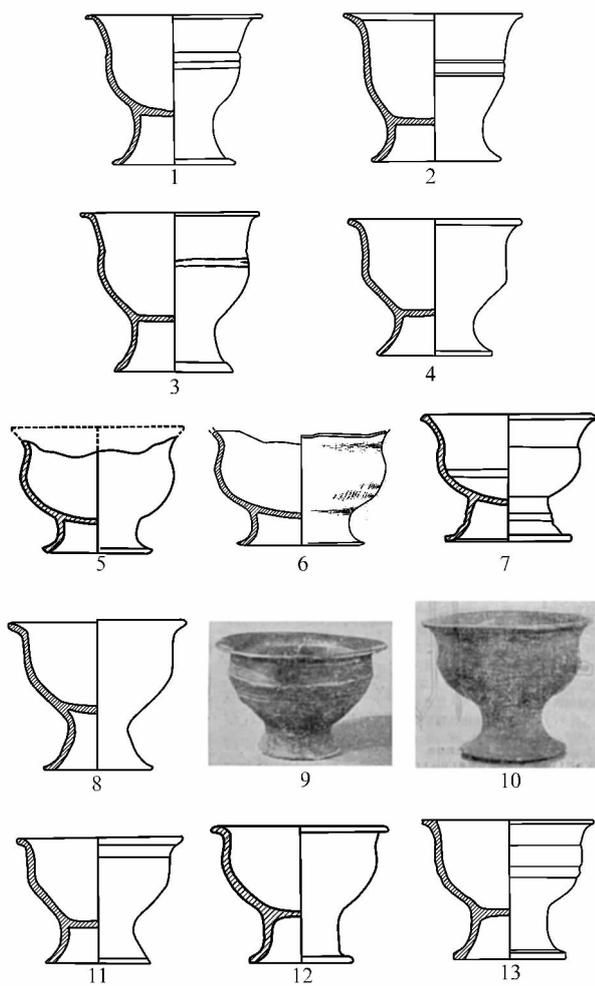
从历史文献及出土文字资料来看，殷墟三、四期或晚商晚期是夷、商互动最为频繁的时期。笔者曾著文指出，商代晚期商王朝对东夷战争的主战场就是在鲁北地区。这一代是古代“青州”之域，渤海和黄海沿岸丰富的海盐等资源是商王朝重点经略这一区域的动因之一<sup>[52]</sup>。殷墟所出土的夷式簋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仍然反映了夷、商间的族群互动关系。

#### 四、陕西、甘肃出土的西周时期夷式簋及其历史背景

除了安阳地区之外，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是夷式簋出土较集中的地区，其影响所及，已经到达甘肃境内的清水、乐浪一带。陕西关中地区所见夷式簋，尤以周原附近遗址出土最多。

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夷式簋多件。根据发掘报告，该墓地所出土的A型陶簋即商式簋，而B型中的I、II两式陶簋即本文所说夷式簋，至于报告划分的B型III式簋，应称之为周式簋。按照张家坡两次发掘报告的分析，这种周式簋实际上源于一种陶盂<sup>[53]</sup>，其原型即1967年发掘出土的盂式簋<sup>[54]</sup>。这三种陶簋各有其演变路径，从西周初年直到西周中期共存于张家坡墓地<sup>[55]</sup>。这是张家坡墓地发掘所揭示的规律。

1967年，张家坡西周墓葬出土的2件夷式簋分别出自M71和M73两座墓葬<sup>[56]</sup>。据报道，两墓为同一组墓葬，均为小型土坑竖穴陶器墓，葬具为一棺，有腰坑殉犬现象，墓向均向东，随葬陶器组合均为鬲、簋、罐。发掘者推测为同一家族，时代为西周初年至成康时期。标本M71:1，泥质灰陶，尖唇，敞口，卷沿，腹部略鼓，饰凹弦纹两周，高圈足。口径22厘米，高19厘米。（图八，1）标本M73:2，泥质灰陶，



图八 周原诸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夷式簋

1. 张家坡 M71 : 1
2. 张家坡 M73 : 2
3. 张家坡 M318 : 2
4. 张家坡 M21 : 1
5. 齐家 M25 : 01
6. 齐家 M25 : 02
7. 齐家 M26 : 5
8. 齐家 M112 : 15
9. 齐家 M16 : 10
10. 礼村 M6 : 1
11. 南指挥村 80M103 : 1
12. 店子 M136 : 3
13. 齐家 M5 : 1

尖唇，敞口，卷沿，腹部较直，高圈足。口径 21.5 厘米，高 18 厘米。（图八，2）

1983~1986 年，张家坡墓地发掘又出土有 2 件夷式簋，分别出自 M318 和 M21<sup>[57]</sup>。均为小型土坑竖穴陶器墓。M318 葬具为一棺一椁，墓向 179°，即西向；M21 为单棺，有腰坑殉犬现象，墓向 77°，东向。二者随葬陶器组合均为鬲、簋、罐。标本 M318:2 泥质灰陶，粗颈，颈、腹分界明显，圆鼓腹，小平底，器身为深腹盆形，圈足粗而高，下裙外侈较甚，腹部有不甚规则的压划弦纹。口径 22.3 厘米，高 19 厘米。（图八，3）标本 M21:1，泥质灰陶，窄沿，圆唇，上腹较直，中腹鼓出而曲折，底径很小，器身为孟型。口径 22.6 厘米，高 19.8 厘米。（图八，4）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均为张家坡西周墓地一期，即武成康时期。

陕西扶风齐家村制袂作坊遗址墓葬出土夷式簋 3 件，分别出自 M25、M26 两座墓葬<sup>[58]</sup>。这 2 座墓葬东西并列，间距约 3 米，均为小型陶器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头向南，方向分别为 180°和 197°，均设有腰坑，M25 腰坑内有殉葬兽骨。墓葬被盗，只发现海贝 1 枚。盗洞内出土夷式簋 2 件，均泥质。标本 M25:01，口沿部残，鼓腹，圈足较矮。残高 14.5 厘米。（图八，5）标本 M25:02，口沿部残，腹部饰两周弦纹。残高 14.4 厘米。（图八，6）M26 陶器组合为鬲 2 件、簋 2 件、罐 2 件，发现海贝 2 枚。报告将夷式簋称为商式簋，以与另 1 件周式簋相区别。标本 M26:5，泥质灰陶，敞口，加厚三角唇，颈较长，颈、腹分界明显，鼓腹微下垂，喇叭口状圈足，圈足饰两周凹弦纹。口径 22.5 厘米，高 17.6 厘米。（图八，7）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标本 M26:5 为夷式簋，口部为商式。

1962 年陕西扶风齐家村 M112 为一小型陶器墓，但报道过于简单，具体情况不详<sup>[59]</sup>。标本 M112:15，夷式簋，泥质灰陶，

敞口，深腹，高圈足。口径 22.2 厘米，高 18.9 厘米。（图八，8）年代为西周晚期。从陶器形制来看，笔者认为或应早至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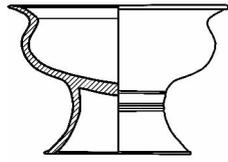
陕西扶风齐家村 M16 为一小型陶器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有腰坑殉犬的现象<sup>[60]</sup>。该墓出土的夷式簋，标本 M16:10，侈口，宽折沿，收腹，束颈，高圈足，腹部饰凸棱和凹弦纹两周。口径 25.8 厘米，高 16 厘米。（图八，9）时代为西周中期。

陕西岐山礼村 M6 为一小型陶器墓，随葬陶器组合为簋 1 件、豆 2 件、罐 1 件<sup>[61]</sup>。标本 M6:1，为夷式簋，敞口，卷沿，束颈，高圈足。（图八，10）报告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晚期，似嫌过晚，应以西周早期，最晚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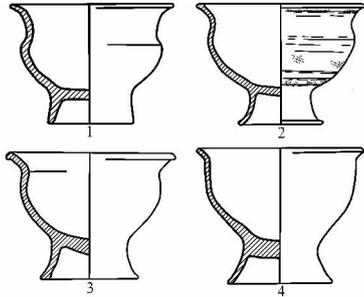
凤翔南指挥村西周墓葬 80M103 出土夷式簋 1 件，报告称为豆式簋。该墓为单棺墓，墓向为 355°，陶器组合为鬲 2 件、簋 1 件、壶 1 件<sup>[62]</sup>。标本 80M103:1，泥质红陶，侈口，腹壁微鼓，高圈足，口沿下有一周弦纹。口径 23 厘米，高 17.6 厘米。（图八，11）时代为西周初期。

陕西陇县店子 M136 为一小型陶器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有腰坑，墓主人为男性。随葬陶器组合为鬲 1 件、簋 1 件、罐 2 件<sup>[63]</sup>。标本 M136:3，为夷式簋，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弧曲腹，高圈足。口径 19.2 厘米，高 17.2 厘米。（图八，12）年代定为西周早期。

陕西扶风齐家村 M5 也是一座小型陶器墓，葬具为一棺，有腰坑殉犬现象，头向朝西。陶器组合为鬲 3 件、簋 3 件、罐 5 件<sup>[64]</sup>。出土夷式簋 2 件。标本 M5:1，泥质灰陶，侈口卷沿，沿面宽平，深腹，圜底，高圈足，腹部饰凹弦纹三周。口径 22.2 厘米，高 17.5 厘米。（图八，13）标本 M5:5，泥质灰褐陶，形制、大小与 M5:1 略同。口径 22.4 厘米，高 17.1 厘米。报告定其年



图九 陕西扶风庄李西 M4 : 08



图一〇 甘肃庄浪徐家碾出土夷式簋

1. 徐家碾 M31 : 7 2. 徐家碾 M63 中 : 5  
3. 徐家碾 M66 : 13 4. 徐家碾 M94 : 23

代为西周早期，似嫌偏早，应以西周中期为妥。

夷式簋在关中地区的有着自己的演变轨迹。陕西扶风周原庄李西 M4 出土夷式簋 1 件，似可作为夷式簋在关中地区西周晚期的代表，甚至可作为其时代下限。M4 为小型陶器墓，曾遭盗掘。葬具为一棺一椁，有腰坑，盗洞内出土鬲 4 件、簋 4 件、豆 1 件、罐 1 件等陶器及海贝等随葬品。墓主人性别、年龄不详<sup>[65]</sup>。标本 M4 : 08，泥质灰陶，敞口，尖唇，斜沿，鼓腹微折，圈足。口径 20.4 厘米，高 14.2 厘米（图九），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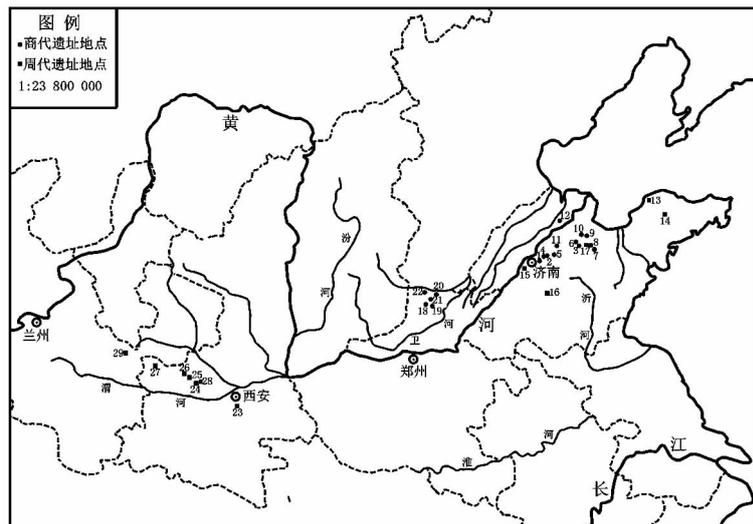
陕西出土的夷式簋主要发现于周原及其附近遗址的墓葬，时代以西周早期为主，中期、晚期虽然仍有发现，但很零星。这

反映了武王灭商及周公东征之后，作为政治中心的周原地区与殷商旧地、尤其是与东方夷人之间联系的加强。据历史文献和出土金文记载，武王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之后，周王朝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将东土贵族成族迁到周原<sup>[66]</sup>。因此，大量东方族群遗物出土于关中尤其是周原地区，也就不奇怪了<sup>[67]</sup>。

值得注意的是，夷式簋在西北地区的出土地点还不止在陕西境内的关中地区，向西更是到达了甘肃境内的清水、庄浪一带。

2010~2011 年，甘肃清水李崖发掘西周墓葬 19 座，除了寺洼文化的 4 座之外，发掘者称之为秦文化墓葬。均竖穴土坑墓，一般有棺有椁，头向西或西北，有腰坑殉犬现象。陶器组合为鬲、盆、簋、罐，部分陶鬲、陶簋具有显著的商式风格。发掘者推断李崖遗址为“文献记载中的秦人先祖非子封邑之所在。”<sup>[68]</sup>

1980 年，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



图一一 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夷式簋分布图

1. 洪家楼 2. 王舍人 3. 苏埠屯 4. 大辛庄 5. 马安 6. 赵铺 7. 河西  
8. 宇家 9. 周宋台 10. 丰城西村 11. 皇姑顶 12. 兰家 13. 周家村  
14. 大北庄 15. 仙人台 16. 郭家泉 17. 岳家河 18. 唐冶 19. 梯家口村  
20. 太平庄 21. 苗圃 22. 小屯 23. 刘家庄 24. 齐家村 25. 礼村  
26. 南指挥村 27. 店子 28. 庄里西 29. 徐家碾 30. 张家坡

地的发掘,集中出土几件夷式簋,发掘者称“在这批墓出土的陶簋中,混杂有7件与寺洼文化陶器截然不同的周文化陶簋”,并予以特别介绍<sup>[69]</sup>。细审这7件所谓周文化陶簋,其I式实为商式簋,II、III两式为夷式簋,另外两式时代应该较晚,为夷式簋在当地的变体。实际上,被发掘者划入本地VI陶簋的标本M94:23、M66:13,也是典型的夷式簋,它们均为泥质陶,与当地的夹砂陶簋区别明显,发掘者认为它们是“仿周文化同类陶簋形制制造的。”这样算来,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共出土夷式簋4件。原报告将其年代定为周先王古公檀父迁岐山之后,应该有一定道理。按照山东及殷墟出土夷式簋形制判断,定在晚商时期是可信的,个别器物如M63中:5或可晚至西周早期。

夷式簋出土于甘肃境内的清水、庄浪一带,确实让人联想到秦人西迁的文献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之先世,谓商代晚期有戎胥轩,娶邠山之女,生中湣,“在西戎,保西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学术界一直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考证秦人源于东方<sup>[70]</sup>,但对于秦人何时西迁及西迁的原因,多语焉未详。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系年》证实了秦人西迁记载的可靠性,而且,《系年》明确提到“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朱圉”,而秦人西迁最早到达的朱圉,地点就在今甘肃甘谷、清水、礼县一带<sup>[71]</sup>。考古工作者恰恰是在清水李崖——北魏时期清水郡治——发现了具有东夷特点的夷式簋,这应非偶然巧合。我们认为,这里出土的夷式簋确应与秦人在周代初年的西迁有关。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中夷式簋的集中出土,说明秦人的一支由清水一带继续西迁,并与当地的戎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即寺洼文化。

附记:本文先后在韩国首尔、四川广汉学术会议上宣读,此次发表做了较大修改。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朱晓芳、王庆铸帮助查阅了部分考古文献,并绘制了器物线图及地图。谨致谢忱!

- [1] 邹衡. 试论殷墟文化分期. 见: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2] 张礼艳.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 考古学报, 2012, (1).
- [3] F. S. Drake, Ancient Pottery from Shantung. Fig. 30 (e), Cf. Fig. 6. Monumenta Serica, vol. IV, 1939-1940, p. 383-405.
- [4] F. S. Drake, Shang Dynasty Site at Li-Cheng Wang-she-jen-chuang Shandong. Figure 1, Figure 7 (a). The China Journal, vol. XXXI, September 1939, p. 118-120.
- [5] 从报道来看,洪家楼确有龙山文化的陶器出土,如同文报道的Fig. 4和Fig. 5两件陶罐即是。
- [6] 邹衡. 试论殷墟文化分期. 原载: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1964, (4). 后收入: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63.
- [7] 张学海. 论四十年来山东先秦考古的基本收获.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336.
- [8] 许宏. 对山东地区商代文化的几点认识.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 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261.
- [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饶县博物馆. 广饶县五村遗址发掘报告.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102.
- [1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州市博物馆. 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254~273, 图六, 7.
- [11] 蔡凤书.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 考古, 1973, (5): 图一, 17.
- [12]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 考古, 2004, (7): 图五, 2.
- [13]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章丘市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章丘马安遗址的发掘. 东方考古(第五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72~464.
- [14] 夏名采. 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183~201, 图十二, 2~6.
- [15] 潍坊市博物馆, 昌乐县文管所. 山东昌乐县商周文

- 化遗址调查.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292~312, 图二, 9.
- [16] 潍坊市博物馆. 山东潍坊地区商周遗址调查. 考古, 1993, (9): 图六, 2.
- [17] 寿光县博物馆. 寿光县古遗址调查报告.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29~60, 图十六, 9、13、17.
- [18] 同 [17]: 图十七, 8.
- [19] 张光明. 淄博市张店周村古遗址调查报告.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6~23, 图九, 1.
- [20] 滨城文物管理所,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 华夏考古, 2009, (1). 图八, 2.
- [21]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徐基等). 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 东方考古(第四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8: 500~503.
- [22] 李学勤. 重论夷方. 民大史学(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方辉.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 东方考古(第一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23] 郑振香. 殷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30~36.
- [24] 潍坊市博物馆, 昌乐县文管所. 山东昌乐县商周文化遗址调查. 海岱考古(第一辑),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292~312, 图七, 9.
- [25] 同 [24].
- [2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饶县博物馆. 广饶县五村遗址发掘报告. 海岱考古(第一辑).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61~123, 图二十九, 6、7.
- [27]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唐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海岱考古(第六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227, 图二七, 1.
- [28] 唐禄庭, 姜国钧. 山东黄县东营周家村西周残墓清理简报.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314~320.
- [29] 王青. 海岱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46~48.
- [30] 李元章. 山东栖霞县大北庄发现东周墓. 文物, 1979, (5): 图二, 5, 4.
- [31] 夏名采. 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183~201. 图十二, 6.
- [32] 山东大学考古系. 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 考古, 1998, (9): 图二二, 1.
- [33]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山东省新泰市文化局. 山东新泰郭家泉东周墓. 考古学报, 1989, (4): 图一二, 14.
- [34] 王迅.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27.
- [35] 王青. 海岱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21~122.
- [36] 寿光县博物馆. 寿光县古遗址调查报告.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29~60, 图十五: 8.
- [37] 吴玉喜. 岳石文化地方类型初探——从郝家庄岳石遗存的发现谈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274~276, 图二, 37.
- [38] 青州市博物馆. 青州市新石器遗址调查.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124~140, 图十一, 1.
- [39] 王迅. 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6.
- [40] 方辉, 崔大庸. 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 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又收入: 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41] 夏名采. 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183~201, 图十二, 3.
- [42] 安金槐. 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 考古学报, 1973, (1): 图一二, 18; 图版10.
- [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07, (3): 图六, 3.
- [4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鄆邓.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图一一七, 11.
- [45]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7, (2): 图十三A.
- [46] 孟宪武, 朱爱芹. 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 华夏考古, 1992, (1): 图六.
- [47] 贾玉俊, 孟宪武, 王素梅. 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95, (1): 图六, 6.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图一〇五5.
-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图一〇五3.
-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小屯.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 图五八, 21、18, 图版二〇, 1.

(下转147页)

文物材质的安全保护、文物信息提取量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原则,充分开展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保存工作,避免为满足其中一方的需求,而损伤文物材质以及信息的保存和提取。

- [1] 周立,毛晨佳.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洛阳孟津唐墓中的应用. 文物, 2013, (3): 83~87.
- [2] 墨西哥惊现血红色玛雅金字塔 诡秘壁画成谜. 中国网络电视台, 网址: <http://kejiao.cntv.cn/20110905/100438.shtml>. 2011-09-05.
- [3] 王珏瑶, 李晓蕊等. 考古发掘现场智能探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10, (1): 8~12.

(上接 72 页)

- [5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3 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 考古, 1975, (1): 图一一, 8.
- [52] 方辉.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末年的征夷方. 东方考古 (第一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又收入: 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张家坡西周墓地.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图二六〇, 5.
-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 1967 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 考古学报, 1980, (4): 图四, 3.
-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张家坡西周墓地.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354~355.
-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 1967 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 考古学报, 1980, (4).
-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张家坡西周墓地.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 [58] 周原考古队编著. 周原——2002 年度齐家村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九六二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发掘简报. 考古, 1980, (1): 图七, 7.
- [6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 考古, 1963, (12): 图一〇, 1.
- [61] 陕西省博物馆, 文管会岐山工作队. 陕西岐山礼村

- [4] 曹军骥, 杨军昌, 胡塔峰等. 西汉张安世墓葬 M1 墓室内的大气环境调查.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13, (2).
- [5] 赵西晨. 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急救车的试制. 中国文物报 2011-11-11 (4).
-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信息中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移动医院正式开业. 人民网, 网址: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207/c172318-20464079.html>. 2013-02-07.
- [7] 杨璐, 黄建华.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中的整体提取技术.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08, (1).
- [8] 于宗仁, 苏伯民等.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在考古发掘现场应用支撑研究中分析体系的构建. 敦煌研究, 2013, (1): 51~55.

(责任编辑: 方燕明)

附近周遗址的调查和试掘. 文物资料丛刊 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图二五.

- [62] 韩伟, 吴镇烽. 凤翔南指挥村西周墓的发掘. 考古与文物, 1982, (4): 图一一, 1, 图版柒, 5.
- [6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中铁路考古队. 陕西陇县店子村四座周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5, (1): 图三, 8.
- [64] 罗西章. 扶风齐家村西周墓清理简报. 文博, 1990, (3): 图二, 6. 2.
- [65] 周原考古队. 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庄李西周墓发掘简报. 考古, 2008, (12): 图一五.
- [66] 辛怡华, 刘宏岐. 周原-西周时期异姓贵族的聚居地. 文博, 2002, (5).
- [67] 许倬云. 西周史 (增补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121.
- [68] <http://www.ccmews.com.cn/plus/view.php?aid=13358>; 侯红伟. 清水县李崖西周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 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75.
- [70] 例如: 韩伟. 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 文物, 1986, (4). 王玉哲. 秦人的族源及迁徙路线. 历史研究, 1991, (3).
- [71] 李学勤.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光明日报, 2011-09-08. 田旭东. 清华简〈系年〉与秦人西迁新探. 秦汉研究, 2012, (6).

(责任编辑: 方燕明)